

博物馆里读中国

从墨痕砖影中重溯民族精神长城

塞防千里固家国——简牍中的长城岁月印记展

徐睿 罗宇盈 王丽娟

当历史的风沙漫过边塞城墙，那些曾被戎卒碾在掌心、被烽火熏染的简牍，以沉默却鲜活的态度，在展厅中铺展出一幅跨越千年的长城史话画卷。长城，这座横亘千古的人类奇迹，早已突破物理防御工事的范畴，演化为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发展内核，诠释着中华民族对和平的不断求索。1月22日，甘肃简牍博物馆、酒泉市博物馆、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塞防千里固家国——简牍中的长城岁月印记展”正式面向观众开放。展览共展出文物219件(组)，珍贵文物199件(组)，其中一级文物51件(组)。

秦汉简牍中褪色的墨迹，恰似时光的切片，将长城的宏大叙事拆解为戍卒的日常、粮秣的调拨、烽火的明灭，乃至商旅的蹄痕。展览以简牍这一“第一现场”的原始资料为叙事核心，通过“开拓”“戍防”“融通”“赓续”四重叙事维度，将长城的军事防御、文明交融与精神传承凝练为可触可感的文化遗产生命力。

第一单元 开拓

本单元以“开拓”为主题，通过系统梳理“历代长城时空轨迹”“营造技艺的工程智慧”与“从汉塞整体防御格局到烽隧建筑细节的微观剖析”三个方面，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城”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宏阔气象，洞见古代军事工程的精妙构造，深化对长城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本单元不仅是对长城历史的回溯，更从当代视角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为观众架起一座连通古今的精神桥梁。

战国秦简瓦(图1)

战国 临洮县博物馆藏 战国秦长城西起临洮县，绵延八百多公里。经考察秦长城临洮段为战国后期秦昭王构筑的军事屏障。这段早于秦帝国大一统五十余年的战略工事，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形态提供了具象化的时空坐标。

长城工牌(图2)

明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藏 这块长城工牌实证了明嘉靖年间修筑肃州西长城时采用的“分层建造”体系，展现了距今400多年前大规模运用于长城营建的工程管理实践。这种“分段承包+整体协同”的双重逻辑，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中锤炼出的文明基因。

转射(图3)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转射是古代戍所坞堡用于发射箭矢与监测敌情的守御装置。其中部设有可旋转的圆轴结构，用于灵活架设弩臂或弓矢，方便戍卒通过圆轴中的孔洞实现120度的敌情监视，同时依托木质掩体遮蔽射击位置，显著降低暴露风险，堪称冷兵器时代攻防一体的智慧结晶。

第二单元 戍防

本单元将戍防战略的宏观维度与生命个体的微观体验相结合，从长城防御组织、军需系统及烽隧戍卒的日常事务等视角出发向观众展示河西汉塞的立体图景。简牍中的细节，如戍卒的征发、箭簇损耗的数量，甚至是友人间的书信雁札，皆成为展览叩击观众情感的触点。这种将铁血防御与人文温情熔铸一炉的文明特质，正是中华民族刚柔并济的基因所在。

甲渠候官诸部兵簿(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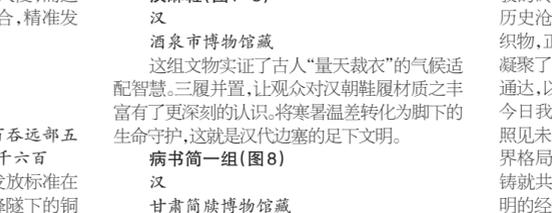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此组简牍为西汉甲渠候官下辖十部武器核检清册，系统记录了烽隧戍卒弩弦、囊矢、矢的配发、存留与损耗数据，是研究汉代军事后勤制度的核心实证。

弩机、箭簇(图5-1)

汉 酒泉市博物馆藏 青铜箭(图5-2) 临洮县博物馆藏 一般情况下，戍卒武器的大致配备为一把弩、五十枚箭，未有弩的则改为一柄有方。烽隧的条件决定了它无法抵抗大规模的人侵，而这种“中程弩射+近距格斗”的武器组合，精准发挥了其作为预警前哨的功能。

“月奉”汉简(图6)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简牍释文：候长一人用钱千二百吞远部五月吏奉四千八百候史随六人用钱三千六百月奉即支付给官吏的俸钱，其发放标准在这枚简牍中得到了具象呈现。大漠烽隧下的铜



简牍释文： 甘露二年三月庚寅朔丙辰东部候长广宗敢言之遇甲寅病温四支不举未

第三队长塞永 病张嘉为封符所报日为病书 居延边塞气候极端，戍边将士饱受疾患的威胁。汉朝为维系战力，在河西构建军事医疗保障体系，既彰显人文关怀，又为稳固边防提供了坚实基础。

《建致中公夫人书》(图9)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该帛书为建写给中公及其夫人的信件。信中阐述了建为感谢中公恩德，经多方打听了解到中公的近况后，殷勤问候中公及其家人的内容。为研究汉代私人书信及边塞戍卒日常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展现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文化延续。

第三单元 融通

展览突破“边塞一战争”的单一叙事框架，在“融通”中以简牍揭示长城作为文明纽带的另一重面相：从派驻军队、设郡置县的垂直管控到移民实边、开渠屯田。这些制度齿轮的精密咬合，将河西走廊从军事屏障蜕变为文明熔炉。大量胡物、译人、贡使简牍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铁甲铮鸣中淬炼出的“战争与和平”。这一单元的叙事，悄然消解了长城“封闭”的刻板印象，转将其凸显为更具开放性的文明通道，使得承载历史记忆的砖石城墙，成为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见证者与守护者。

徙民汉简(图10)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简牍释文：当徙徙未行未到若亡勿徙徙前有罪勿发觉勿治奏当上勿上其当出入其口口口在所县为徙徙者谿廷尉台如律令丞相御史分行诏书为驾各

据汉简记载，这些移民实边的民众需要向当地官府缴纳赋税，并定期服役。他们在为自己的新生活辛勤劳作的同时，也为巩固汉王朝的边疆安全、开发河西地区的经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彩绘木牛(图11)

武威市博物馆藏 这件文物是典型的汉代河西木雕，它憨态可掬，以写意的刀法凝结汉代木雕形神兼备的独特美学。在汉代河西地区，除了对人进行造册登记形成名籍外，对牛也实行类似的管理办法。这件木雕造型背后凝结的不仅是艺术匠心，更是边塞长城精明管理的文化见证。

归义汉简(图12)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简牍释文：归义大月氏人一人 贵人口一人男一人自来龟兹王使者二人口口三人凡八人 汉王朝对留居在河西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属国进行管辖，最终在河西走廊铸就“和而不同”的治理范式。方寸木简间，尽显中央王权与怀柔智慧。

《调史监遮要置册》(图13)

汉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该册记录了监遮要置官吏张禹卸任、解蔽接替的调令流程，完整呈现汉代边疆官吏任免程序。文书中的干支纪日、“如律令”等格式，印证了汉代公文制度的规范性。

第四单元 赓续

展览的当代性，在“赓续”中得以升华。策展人以“观众互动”与“数字人文”为双翼，在历史纵深与时代语境的对话中，赋予简牍新的生命，重构长城文化价值。本单元通过互动多媒体、沙画叙事、“我心目中的长城精神”互动墙等展陈方式实现长城从“夯土记忆”向“新时代数据基因”的转换。使长城从古代物理防御工事蜕变为现代的文明链接，让观众在观展的同时感受新时代的长城精神。

本次展览的策展智慧，在于以简牍的微观史实解构长城的宏大叙事，又以文明交融的视野重塑其精神内核。当历史的峰峦浸染展厅，斑驳的砖瓦在暖光中舒展千年肌理，那些记录着历史沧桑的尺牍帛书，刻画着边塞生活的鞋履织物，正以静默之姿诉说着长城的伟大精神，它凝聚了开拓者的坚韧、戍边者的忠诚、商旅者的通达，以及无数无名者用生命书写的文明信念。今日我们驻足凝视的不仅是历史的遗珍，更是照见未来的明镜，它时刻都在启示我们，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山海翻覆，唯有以自强不息的精魂铸就共同体的基石，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编织文明的经纬，方能构筑起跨越时空的精神长城。

龟兹寻踪：一位考古学家的西域手记

冯佳乐

龟兹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大国之一，疆域范围包括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等县，以库车为中心。黄沙笼罩下的龟兹，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璀璨明珠，见证了龟兹乐舞的婉转动听与石窟艺术的千年沧桑。无数探险家、考古学家趋之若鹜，斯坦因和黄文弼的足迹就曾在交汇。斯坦因原籍匈牙利，后加入英国国籍，自20世纪初始，他先后踏足中国西域各地，进行四次中亚探险考察，第二次考察中发现举世震惊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大批写经和幡画，第三次考察中曾涉足龟兹古城。而黄文弼是在新疆考察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涉及遗址类型最多的中国学者，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谈及龟兹史，离不开黄文弼的考古调查。巧合的是，黄文弼的一生中同样有四次到过新疆进行考察，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向西行进。通过这位考古学家的西域手记，龟兹的历史踪迹也就逐渐明晰了。



黄文弼在新疆考察途中(源自北京鲁迅博物馆《西北科学考察团90周年纪念展展览图录》)

故事缘起——五四运动影响下的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湖北汉川县黄家嘴人。黄文弼的父亲起初以木匠为业，家境清贫，后转行经商，方渐宽裕。年少时，黄文弼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学业表现突出。1915年，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三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国学研究所助教。此时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与“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思潮，给黄文弼的思想带来深刻洗礼，促使他的学术志向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初期的宋明理学探讨，转向目录学研究，最后专注于考古学与西北史地学的研究。

和黄文弼同样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还有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学术界的高涨，学术界提出了“学术救国”的口号。中国西北地区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吸引了众多外国探险队，他们的考察与探险活动虽然让世界更了解这片土地，却也致使许多珍贵资料流失海外。文物的流失与国家主权遭受威胁的双重局面下，中国学者愈发重视边疆史地研究，将目光投向西北文物资料整理。1926年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队抵华，计划开展西北地区的科学考察工作。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家牵头成立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赫定展开多轮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平等协议“十九条”。1927年5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自北京揭开序幕，年仅34岁的黄文弼也由此开始他的西域考古之旅。

龟兹寻踪——在库车的考古经历

黄文弼作为考察团成员，出于记录考察内容的需要，有着随时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库车及其他考察地区的风土人情、所见所感和其学术思想，为后世进行西北史地研究留下了珍贵的一手材料。1928年，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一行人考察完新疆数地后，辗转来到库车一带，寻踪龟兹。自9月上旬开始，历访库车、新和、沙雅、拜城等地遗址，有古必访，马不停蹄，工作一直持续到11月方结束。通过这段手记，汉唐时期龟兹的文化、政治、经济情况也就跃然纸上了。

黄文弼等到库车后，9月3日赴库木土拉考察，并在库木土拉千佛洞内发现瓦片、铜片、纸片、佛像残件等出土遗物。公元1世纪左右，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商人们在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佛教开始传入龟兹地区。龟兹国的统治者在两汉之交开始接受佛教，佛教迅速成为国家的主导宗教。佛教的官方化在龟兹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库木土拉即是龟兹的佛教中心之一。

班固《汉书·西域传》中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阚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新唐书·西域传》中提到：“龟兹一曰丘兹……姓白氏，居伊罗卢城。”由此可知，汉代龟兹都延城，唐代则都伊罗卢城。龟兹古国的政治中心，即王都所在，也是黄文弼探寻、考察的重点。1928年11月15日，黄文弼等查看库车城附近古址，在库车之东北城上河旁，有一地名皮郎，亦名哈拉墩。他根据《水经注》考证推断，以哈拉墩为中心的皮郎古城就是汉代龟兹都延城和唐代都伊罗卢城的遗址。故城内

外，有包括哈拉墩、皮郎墩、萨克沙克墩等在内的十多处遗迹。从这些遗迹中，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土陶片、铁块、黄铜残片、玉石耳坠、剪边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等。在库车休息数日后，黄文弼于11月19日出发前往库车拜城山中，抵达可可沙。可可沙是旧时龟兹的矿区，现多称其为可可沙炼铁遗址。黄文弼在此发现炉灶遗址和铸铁小陶罐，推测为旧时炼铁的场所和用具。此一带之山名叫哈玛木达克，山腰有许多井穴，是本地人挖掘硫磺及白矾的地方。哈玛木即澡堂，因洞中热气腾腾故名，传说病人来此地坐上片刻即可痊愈。由此可见，龟兹冶铁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与《汉书·西域传》中之记载互证。

老骥伏枥——第四次前往新疆考察

1933年，黄文弼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的身份，开展第二次蒙古考察，次年返回。迫于新疆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的混乱政局，黄文弼原计划受阻，转道罗布泊进行考察。1943年，他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甘考察，此次改经河西走廊，重点考察敦煌莫高窟后入疆，以新疆为主要调研区域，但受抗战影响仅能开展调查而非发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当时的他已然年过半百，但对西域历史研究的热爱却不减当年。中科院的同事、后辈尚爱松曾作《奉慰黄文弼先生》一诗，将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英雄黄老将，拄杖来上班。行路虽云慢，内心实坚韧，今日总统府(戏言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考古所在黎元洪旧址上建)，昔年天山巅。大漠歌仍壮，长安日正圆，但见烟岚袅，哪有泪涓涓。秋风好作健，再干三十年。”

1957年的秋风吹过，掀开了64岁黄文弼第四次新疆考察的序幕。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重新发掘了龟兹古城遗址，系统地到库车地区的龟兹城进行了查勘，并调查、试掘了明田阿达古城、大黑沃沁古城、苏巴什遗址、哈拉墩遗址等地，采集大量文物。可惜英雄迟暮，力不从心，1966年黄文弼于北京逝世。

黄文弼所撰写的《罗布泊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以及《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合称“三记两集”，久负盛名，成为研究西域历史必备的参考文献。第一、四次考察分别留有《黄文弼蒙古考察日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经后人整理后相继出版。黄文弼虽逝，但其学术精神与研究成果永存。

龟兹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又吸收了印度、波斯等多重文化精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龟兹的石窟壁画、音乐舞蹈，至今仍闪耀着千年前的辉煌，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黄文弼的足迹，犹如时光的桥梁，连接古今，揭示龟兹文化的璀璨与多元，更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本文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一般项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文物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GBKX2024Y26)阶段性成果】



黄文弼第一次蒙古考察日记手稿图(源自中国国家博物馆)



库木土拉千佛洞铜笔写生图(源自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